

【中】周小亮 (Xiaoliang ZHOU)

个人简况

周小亮，福州大学经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福州大学庭芳院28栋102

邮编：350002

E-mail: xlzfzu@163.com

# 危机成因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与中国和谐改革发展之思考

【中】周小亮

内容提要：不同经济学者及金融危机模型对金融危机的成因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但他们大多数是从金融层面谈金融危机问题，没有从市场体制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内在本质上去剖析金融危机的本质性原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制度分析见长，为此，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框架与逻辑思维，分别从直接诱导成因、基本制度成因及社会背景条件等三大层面，侧重于制度角度，并结合本次金融、经济危机的特征，去剖析金融危机的市场运行与制度成因。并以此为戒，分析、探讨了我国和谐改革与发展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些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关键词：金融危机 成因分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改革与发展

## 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与金融危机成因的概要分析

自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牙买加体系建立之后，金融危机频繁性产生，并且其后果益发严重。尤其是，2007年2月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其危害的深度、广度不断加深与拓展，已被媒体形象称之为“金融海啸”，不仅如此，其性质已向经济危机转化，并有可能转化为一次历史性的世界经济危机。为此，很有必要探讨这场金融危机的成因。危机产生以后，各种媒体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众说纷纭的成因解释。有人从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角度进行解释；有人从美国主导的世界性货币金融扩张政策角度进行解释；有人从信用膨胀与金融产品创新中的风险累积角度进行解释；有人从自由市场政府监管缺失角度进行解释，如此等等，不一列举。从现代金融危机理论与模型来看，西方金融理论针对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相伴发生的金融自由化、金融中介信用过度扩张、大规模外资流入与波动、过度风险投资与资产泡沫化、金融中介资本充足率低与政府监管缺失等经济现象，在第一代（Krugman, 1979）和第二代金融危机模型（Obstfeld, 1994、1996, Sachs、Tornell和Velasco, 1996)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以由金融恐慌所驱动的金融危机模型、由经济基础变量所驱动的金融危机模型、强调金融系统不稳定性的金融危机模型等为标志的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参见朱波、赵锦辉, 2005）。这些模型分别从信息不充分下因恐慌心理而撤离资金、政府隐形担保而导致国内银行巨额不良资产、银行存款者之间的“协调失败”而导致的银行挤兑等角度去解释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原因。

上述媒体、学者和金融危机模型对危机成因的解释，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们仅从金融层面谈金融危机问题，没有从市场体制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内在本质上，去系统地剖析金融危机的本质性原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制度分析见长，它对经济问

题的分析主要是深入到经济关系的本质层面进行分析，并且它主要是以批判的角度，将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经济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社会再生产中的矛盾运动问题，并强调在此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或经济危机。从这个角度上说，马克思经济学关于危机的分析是更为深刻的。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生时期，经济危机主要是发生在实体经济的产业经济（主要是棉纺织业）领域，并以“生产的相对过剩”为主要特征。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对经济危机的分析，主要是结合大量的19世纪英国机器化、工业化背景下产业经济危机现象，运用矛盾分析法，并侧重于制度视角，从交换、生产、消费到社会经济制度，对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实体经济危机成因进行全面系统的剖析。

从市场交换角度看，在马克思看来，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由于货币的流通手段使商品在时空上发生了分离与对立，而货币支付手段职能形成了蕴含货币危机的债务链条，由此，一方面使商品“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另一方面又使“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33页）在商品与货币市场交换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并服务于它的资本主义货币制度、银行制度、汇兑制度、信用制度等，为交换领域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市场交换领域矛盾的激化，潜在危机的现实化提供了制度结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制度结构之间的不协调与相互碰撞，对经济危机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生产角度看，马克思认为大工业生产方式具有一种跳跃式的扩张能力，这种扩张能力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共同作用，促使资本生产扩张力增长，从而激化市场供需矛盾，致使危机从可能转化为现实。因此，大工业的巨大迅速扩张能力，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物质前提。而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制度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规律、资本占有规律、市场竞争规律则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能力的跳跃扩张提供强大的利益刺激和外在压力；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为社会生产的盲目扩展提供“宽松”的外部环境或宏观制度结构。

从消费角度看，在马克思看来，随着技术进步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造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工人绝对与相对收入的减少，而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以及由之决定的社会产品的分配是一种对抗性分配。由于这种对抗性分配制度的存在决定了劳动者的消费、需求只能局限于狭小的界限之内，并由此而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生产与消费的脱节和生产的相对过剩。

最后，马克思强调，生产、交换和消费中的矛盾运动，以及决定这些矛盾运动的一系列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矛盾运动，其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社会根本经济制度和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是爆发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还必须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重点是分析生产过剩危机，但同时也分析了与生产过剩危机密切相关的“货币危机”与“信用危机”。关于货币危机，马克思将它分为两类：其一是作为“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的货币危机；其二是“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前一种货币危机实质上“作为经济危机

的一个特殊阶段的金融危机”，其成因基本上可以用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成因来说明；而“后者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金融”。为此，我们可以将它视作为“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马克思曾经认为货币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相伴并生的一个特殊阶段，但后来马克思已认识到金融市场自生危机的可能性。并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中，通过对生息资本、信用、虚拟资本、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的本质特征、功能机制及其增值规律的历史分析，认为“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存在相对独特的成因。他认为市场竞争加速资本积累；债券、股票、汇票、土地所有证等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产生的基础和条件。马克思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明确指出过，以股票发行为代表的虚拟资本的发展，不仅造成了生产垄断、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也改变了金融体系的状况——投机、欺诈、神经过敏和金融贵族。马克思说，信用制度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99）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在19世纪工业化背景下，主要是以实体产业经济的生产相对过剩经济危机为研究对象，并侧重从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规律和本质特征的角度去分析其成因，但同时，也结合了当时初级形式的信用与虚拟资本的运行特征与本质属性，分析了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的特征与成因。本次金融危机虽然主要是表现为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从表面现象来看，是由于各种类型的虚拟资本的过度扩张而引起金融系统的极度不稳定而爆发，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因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与矛盾运动的累积而产生。因此，从逻辑上说，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可以从本质角度来解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但我们必须对这次危机的新的特征作出相应的拓展与深化分析。

## 二、本次危机成因的三维分析

从马克思经济学视野来看，我们认为本次危机的成因，可以从理论上概括为：两大脱离即虚拟与现实、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脱离；两条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与市场竞争规律；一大背景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导下的全球化、私有化、市场化运动。具体来说，可以如下三大方面来分析其成因。

（一）直接诱导成因是美国经济金融化与信用货币膨胀下的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背离。

始于1971年的第五次技术革命即信息革命，其特点是信息化，其对应的生产方式也不同于以重型机械化与重化工业为特征的以往技术革命。因为信息革命产生的新产业基本上属于信息密集型产业，其发展主要依靠知识与人力资本，而不需要大规模经营与大量金融资本的注入。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信息技术革

命扩散程度的扩大，新技术革命进入到狂热阶段，致使新产业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由此则不可避免地要在金融资本与现实生产资本之间产生分化与分离，从而出现“互联网泡沫”经济。互联网泡沫的形成，使得大量的金融资本从实体经济中分离出来，并通过金融创新而衍生出大量的虚拟资本。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利润来源的虚拟化，促使美国经济出现明显的金融化特征，即美国经济、美国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多并主要是来自金融渠道而非商品制造。

在美国虚拟资本的膨胀与经济的金融化过程中，一方面，虚拟经济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另一方面，美联储为了应对“互联网泡沫”破裂可能引发的经济衰退，又实行连续降息的货币政策。在低利率的刺激下，导致美国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并带动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迅速发展及房屋价格及房屋信用泡沫的渐渐变大。其结果既膨胀了金融市场，又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经济的虚拟与金融化。之所以美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后出现虚拟与金融化趋势，从宏观政策上看，是与美国意图通过扩张性货币金融政策来转嫁其内在的金融风险密切相关。由于美国多年来的赤字财政政策以及多次对外发动战争，导致美国政府积累了巨大的政府赤字。为了弥补政府赤字转嫁债务，美国就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增加美元发行。其结果是产生美元危机与浮动汇率制的推行，并给世界带来频繁的金融与经济危机。

（二）基本制度成因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与矛盾运动的累积。

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与过度投资，将引起社会再生产中各种平衡比例关系的打破，以及社会资本运行中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等一系列矛盾的累积与激化。之所以有此逻辑关系，在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存在自身的内在缺陷与矛盾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自由市场制度的缺陷主要是表现为由于自由市场内在的矛盾运动而必然会引发各种经济比例关系的破例与失衡，从而使市场经济运行出现周期性波动。马克思认为商品是自由市场的最基本、最单纯的构成要素与物质形式，价值规律与竞争规律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两条最基本运行规律。在自由市场交换过程并随着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形式的发展，商品内在的基本矛盾外化为商品与货币的矛盾，而货币的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职能使商品买卖在时空上发生分离与对立，并由而衍生出蕴涵货币、金融危机的债务链条。特别是在以信用为基础的商品交换中，“商品与货币的矛盾运动还可以促使商品价格和价值之间不仅存在量上的偏离，而且还可以在质上完全背离，即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17页）。因此，我们可以进行逻辑推断：作为自由市场胚芽与逻辑起点形式的商品内在矛盾运动，必然会产生债务链条的断裂与价值和价格之间的严重背离，从而引发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严重背离，进而必然要产生货币与金融危机。

另外，马克思强调，要使产业资本与社会总资本得以良性循环运动，则产业资本运动必须在空间上并存、时间上继起，并要以价值革命得到克服和抵消为前提。然而，在自由市场的矛盾运动中，由于价值规律与竞争规律的自发作用，必然会使商品与要素市场中发生价格剧烈变动即“价值革命”。价格的剧烈变动则要破坏资本循环、

资本周转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正常进行与良性循环运动所需要的各种客观比例关系。因此，随着价值规律与竞争规律自发作用下自由市场剧烈矛盾运动而产生的价格剧烈变动，必然要致使自由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生产呈现周期性运转特征，并在矛盾异常剧烈时，产生信用破裂、商品积压、生产衰退、企业关闭等社会经济现象，即经济危机现象。

不仅如此，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分析，并没有停留于经济现象与一般意义上的市场运行中的矛盾分析，而是深入到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与基本经济制度中去探寻市场失灵和经济危机的根本制度成因。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因此，“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14页）。目前，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有了历史性的变革，但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的内在本质不仅没有变化，而且在金融资本主导下的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资本的贪婪性有过之而不及，只是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的历史形式变得更为“资本集中”与“虚幻泡沫”而已。

为了实现资本的贪婪增值，美国等中心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通过技术革命与并购重组、规模经营、产业集中等组织创新以刺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相对缩减员工工资与社会福利支付，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积累率。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积累率的提升，造成了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与资本相对过剩，由此则要增强市场竞争，促成商品的生产过剩，造成经济周期性波动与危机，从而引起产业工人就业状态的不稳定与就业率的下降。其结果，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呈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黄金时期”的同时，社会财富的分配差距也出现持续扩大趋势。

社会财富的分配差距的扩大与基尼系数的持续上升，表明美国广大工人阶级的消费增长缺乏应有的收入增长基础，由此则必然要影响“有效需求”，进而将产生生产的相对过剩。为了在生产扩张与资本逐利的过程中，不因“有效需求”不足而引发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美国采取了为劳资双方共同认同，并为政府肯定的“透支消费”这一扩大“有效需求”办法。于是，各大金融机构、投资银行着力进行金融创新，以刺激广大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进行“透支消费”。但是，从本质上说，“透支消费”只不过是靠透支“未来”来支撑“今天”，它只是为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创造“虚拟消费”条件，因而只能延缓经济危机的发生时间，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由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矛盾运动所决定的经济危机。

（三）社会背景条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导下的全球化、私有化和市场化运动。

上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开始兴起，并逐渐在政府决策中取代凯恩斯主义。在实践上，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取代了原来管制的资本主义。市场原旨主义主导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行为，致使政府决策凸现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特征：即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允许自由市场的存在与扩张；消弱政府宏观调控，强化自由竞争和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减少社会福利支付；设定国有产权效率低于共有产权效率，而共有产权低于私有产权命题，推行公共产品与服务私有化，

主张市场导向的政府管制；力推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倡导商品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自由流动。这些新自由主义与市场原旨主义的政策主张，在为美国金融、经济危机的创造转嫁条件的同时，也为这次美国更为深刻的金融、经济危机的产生和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的发生创设了社会背景条件。

在全球化名义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后，加快了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全球化步伐，并逐渐形成了“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的新的国际分工模式与秩序。在新的国际分工模式下，一方面，整体国际平衡是以各国的极度不平衡发展以及国际信用数量的扩张、期限的延长为基础而造就的；另一方面，消费国的稳定增长，成为国际平稳运行的关键所在。由此决定了以美国为首的消费国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2001年以来全球“创新”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就是美国依靠过度信贷拉动过度消费，从而带动其他国家尤其是东亚和中东欧经济体出口，进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此国际分工模式也蕴涵着极大的金融、经济危机性。因为，一旦美国为首的消费国增长失速、消费乏力，那么随着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倒下，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转型将无可避免。

不仅如此，80年代以来，世界在掀起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还掀起了新经济自由主义与市场原旨主义主导的所谓“华盛顿共识”改革浪潮。大力推行私有化与市场化经济改革政策。在此背景下，美国等核心资本主义国家放松对投资银行等金融部门的资本监管，使其过度杠杆化免受监管。因此，华尔街投行不仅普遍实行高杠杆商业运作模式，而且还通过金融创新，制造出使次贷数量呈指数级放大的无法定价的金融衍生工具，并且在证券化过程中，过度衍生使许多金融产品远离初始的客户和最初的授信关系，信用链条不断延长，信息不对称程度骤增，道德风险集聚。由此就必然使华尔街投行的高杠杆商业模式含极大的金融风险。

之所以华尔街投行有会采用高风险的商业运作模式，除了政府监管缺失之外，还与不合理的激励机制等制度设计密切相关。华尔街投行实行的激励机制，其特征之一是对高管人员实行重点倾斜，但高管的薪酬和激励机制没有与机构的风险管理、长期业绩相挂钩；特征之二是华尔街投行的高管薪酬存在明显的刚性，其表现是，即使投行亏损了，高管的收入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这样的激励机制只有权利没有义务，其结果是因丰厚的短期回报将导致高管疯狂追逐高额利润的高风险行为，由此必然要投资银行金融风险的高度积聚与无限放大。当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经济的核心——华尔街投行的金融风险积聚、放大到足以使其乃至全球资本再生产客观上需要的各种经济比例关系破裂时，则将先在美国等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然后扩展到全球爆发“金融海啸”，进而引发全球经济危机。

### 三、在化危为机中促进中国和谐改革与发展

综上所述，本次危机的原因可以概括为是在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律和其内在矛盾运动的作用下，致使美国等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乃至全球市场经济国家各种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衡的必然结果。中国在过去30年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取得了经济

持续高速发展的伟大历史成就。但是，也经历了较为严重的生产过剩与通货膨胀，经济发展也出现了大起大落。尤其是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难题。在这次金融、经济危机中，中国的资本市场出现了剧烈的快涨急跌，并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严重暴露出中国因经济增长模式的历史路径依赖和非均衡市场化改革以及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过程中所产生各种结构失衡问题。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改革的角度，都存在一个如何增强协调性与和谐性问题。

中国要减少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则必须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和谐改革与发展之路。为此，在理论上，从短期应对危机的角度上说，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努力夯实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与劳动生产率和GDP同步增长制度基础，同时着力从制度上防患因收入差距扩大而引起金融与经济危机；与此同时，要借鉴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完善市场体系与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强化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从长期和谐改革与发展来看，则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系统论和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和谐经济思想为指导，探讨结构主义视野下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与模式，进一步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本质特征，以创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在实践上，我们既要全面而深刻分析本次金融、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与挑战，但更应树立信心，并要看到“危”“机”同在与“危”中有“机”。为此，必须认真研究我国改革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结构失衡问题，抓住危机之后所引发产业并购与重组的历史性机遇，着力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与宏观调控能力与水平的提升，努力推进中国和谐改革与发展。结合本次金融、经济危机的深层本质原因的分析，如果从推进未来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我们认为今后应认真研究七大协调问题的和谐解决：

（一）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与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发展之间的相互协调问题。

为此，要认真研究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运行机制与其特殊制度禀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间，如何才能实现相辅相成与相互融合，特别是深入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在相互统一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性质的摩擦及如何协调等问题，以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和特征，以及如何通过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与创新，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二）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相互协调性问题。

即要探讨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如何实现开放、改革与发展的良性互动，以及如何实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与独立自主发展之间的相互协调与相互推进。为此，要着力分析对外开放与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协调关系，即既要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目标、阶段任务、推进方式对对外开放的进展、形式及领域的规制与选择

有什么历史性与阶段性的变化和要求，也要研究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体系的过程中，对国内经济体制与制度系统会带来什么协同变革的具体要求。与此同时，要从策略性角度，研究在对外开放中如何实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与防范、化解国际金融与经济风险。

### （三）市场有序运行与完善宏观调控的协调性问题。

经济波动与经济危机的发生，首先是表现为市场结构失衡与市场运行矛盾的激化，为此，我们要实现国民经济的有序运行，其基础性环节就是要完善市场体制。而市场不仅是一个定价机制，而且还是一套制度体系。为此，我们一方面要深入分析构成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中观和宏观不同层次制度以及各层次内部的不同制度之间的相互协调关系，同时要发展、完善各类要素市场，健全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与其利益协调功能。另一方面，要通过对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规律与特征的分析，特别是结合目前金融、经济危机的成因分析，探讨宏观调控与市场高效有序运行之间内在逻辑关系，进而重点解决市场机制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与政府宏观调控的有效结合问题。

### （四）产权改革与收入分配改革中的利益协调问题。

因所有制与产权关系而造成收入差距过大，进而引发生产相对过剩危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危机成因论的基本论点。因此，我们要避免经济危机，实现持续稳定经济增长，则必须夯实利益兼容基础上财富增长的制度基础。为此，我们一要在产权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中实现不同经济主体平等竞争、相互促进与协调发展；二要以企业所有权结构动态变化为基础，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劳资利益矛盾与利益共生的多层次表现形式与基本规律，研究劳资之间激励相容的制度条件，进而探索有利于改善劳资关系、实现激励相容的企业所有权结构形式；三要从更加关注民生和公平的角度，研究如何通过微观分配制度的变革与系统性、均衡性、对称性和互补性的市场化体制创新，处理好收入分配中的利益协调关系。

### （五）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中的资本深化与劳动吸纳的相互协调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危机理论与世界危机历史表明：每次金融、经济危机之后，均会进行新的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进而促使世界经济跃上一个新的发展台阶。为此，我们要实现中国持续和谐发展，则要重视知识和科技力量，要着力进行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革命，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我们应深入分析我国的资源约束特征，既要通过技术提升、资本深化来提高微观企业与产业的技术含量与资本密集程度，同时要立足劳动力充裕与过剩的基本国情，优先考虑社会就业问题，积极扩大与消费、就业密切关联的产业投资，努力提高单位资本的劳动吸纳系数。

### （六）区域经济和谐发展中的协调性问题。

长期历史积累下来的区域经济不平衡、不协调发展问题，既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调的一个重要诱导因素。如何解决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将是我国和谐改革与发展中的必须逐渐加以解决的一个中心命题。为此，我们要从和谐改革与发展的要求出发，深入分析区域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争夺产业利益的重复建设、市场封锁和地方保护问题，以及区域经济系统配置资源差异、区域人力资本差异、区域差距拉大后的利益失衡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区域经济与体制机制的协调发展与协调变革的方式与途径，探索化解区域利益冲突实现区际协调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不断加深对区域经济和和谐改革与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实践上要认真贯彻落实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并以实践中积累的新经验不断充实完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 （七）保增长中扩大投资需求与刺激消费需求的相互协调问题。

有效需求不足是金融、经济危机的基本成因。为此，要治理金融、经济危机，我们必须以刺激有效需求来保增长。而在外需下降的条件下，我们要确保经济增长，则重在扩大内需。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制约因素是消费需求不足，所以我国扩大内需的重中之重是如何在保民生中扩大有效消费需求。为此，我们要充分运用各种经济杠杆，着力解决广大民众的就业增长与收入增长机制，在此基础上，扩大居民消费倾向。同时，政府在保增长过程中，要协调好扩大投资需求与扩大消费需求的关系。切忌在投资比例一直偏高并一直有投资偏好症的约束条件下，过分依靠扩大投资来解决经济危机。这可能为中国长期和谐改革与发展留下隐患。

### 参考文献

[1]朱波、赵锦辉.金融危机理论与模型的最新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 2005(3).

[2]凌云.论马克思金融安全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实践意义[J].理论前沿, 2007(5).

[3]Chang R and Velasco A.,1988, The Asian Liquidity Crisis NBER Working Paper, No.6796.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5]卡萝塔·佩雷斯.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6]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J].国外理论动态, 2008年(6).

[7]严海波.美国金融危机转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第二届(2008年10月, 西安)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论文集.

[8]赵磊.对美国次贷危机根源的反思[J].经济学动态, 2008(11).

[9]周小亮.市场失灵及其制度矫正的两种经济理论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 2002(2).

[10]何诚颖等.国信证券关于次贷危机系列研究报告之一: 独立投行模式: 运作

绩效、危机机理与发展路向选.2008(11).

[11]李铁映.改革开放探索[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12]JAC C.Heckelman and Stephen Knack.(2008), Foreign Aid and Market-Liberalizing Reform ,Economica, August.

[13]Marangos,John(2004)”Alternative Economic Models of Transition”,Published by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in U.S.

[14]James A. Younker,(2001)”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ket Socialism: Essay sand Analyses” by Ashgate Publishg Company in U.S.

[15]樊纲、胡永泰.”循序渐进”还是”平行推进”? 论体制转轨最优路径的理论与政策[J].经济研究, 2005(1).